

论古典政治经济学关于 经济规律客观性的思想

吴忠观 吴世泰 邓星盈

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产生于十七世纪中叶，完成于十九世纪初期。这一时期正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处在由产生到成长的前进阶段，也是英、法两国实现资本主义工业化的阶段。古典政治经济学代表当时反对封建制度的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力图阐明经济现象的内在联系，把理论的考察从流通领域移到生产领域。它对促进和巩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于推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力的发展起过重大的作用，是资产阶级同封建制度及其残余作斗争的理论武器。关于经济规律客观性的思想，就是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用以反对封建势力，为新兴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开辟道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原理之一。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奠基人威廉·配第就十分重视经济规律的客观性。他把整个国民经济比作一个人体，把农业和工业的产品比作是国家的“血液”和“营养液”，而商业就是促进这些血液和营养液循环的静脉和动脉（《赋税论》，《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选辑》第28页）。他认为经济的运动就象人体的生理变化一样，有它本身的规律。他说：“事物有其本身的道理，自然是不能欺骗的。”（同上书，第18页）他指出：在政治经济学中如同在医学中一样，必须考虑到自然过程和适应它们，而不能“用自己本身的暴力行动”来反对自然过程。正是由于他承认经济生活有其自身的规律，所以他能从经济现象的表面，深入到经济现象的内部研究问题，从而创立了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奠基人布阿吉贝尔也非常重视经济规律的客观性。他多次运用“自然规律”的概念来分析经济问题。他强调经济生活有它本身所固有的规律，人们只能按照自然规律来行事。他说：“必须顺着大自然行事”（《谷物论》，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70页），“整顿经济秩序的权力只属于大自然”（同上），“经济秩序的规律的破坏绝不是没有后果的”（《法国详情》，《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选辑》第135页）。他甚至说：“对于应当视为神圣的自然规律的违背，乃是大众贫困的首要原因”（《论财富、货币和赋税的性质》第110页）。

古典政治经济学创始人关于经济规律客观性的思想，在重农主义的经济学说中形成为关于“自然秩序”的完整学说。在他们看来，所谓“自然秩序”就是一种理想的秩序，它是一种由上帝旨意安排，而不是以人们意志和愿望为转移的客观存在。与“自然秩序”相对立是“人为秩序”。他们认为如果人类认识到“自然秩序”，并使“人为秩序”适应自然的需要，那末社会便处于健康状态。相反，如果违反了自然秩序，社会便会陷入疾病状态。所以他们强调必须研究自然秩序，按自然秩序办事。重农主义的创始人魁奈曾经明确指出：“国民明显的应该接受构成最完善的管理的自然秩序一般规律的指导。对于一个政治家应该具备的学识

来说,只研究人为的法律学是很不够的。有志于行政职务的人,必须对于构成社会的人们最有利的自然秩序进行研究。”(《农业国经济管理的一般原则》。《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选辑》第228页)亚当·斯密继承并发展了重农主义关于自然秩序的思想。他常常用“自然趋势”这一概念,并提出要“顺应事物的趋势。”(《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第342页)他所说的“自然趋势”也就是自然秩序。并且他还消除了重农主义关于自然秩序的封建的神学外观,把自然秩序理解为从人的利己主义本性产生的一种正常的社会秩序。他把资本主义制度叫做“自然自由制度”。他认为只有顺应自然秩序,克服那种束缚个人自发的创造性的非自然秩序,才能促进国民财富的增长。只有取消重商主义政府的干预经济生活的政策,才能建立起最能增进国民财富的“自然自由制度”。他说:“违反自然趋势……那只能阻碍,而不能促进社会走向富强的发展;只能减少,而不能增加其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的价值。”(同上书,下卷第252页)而“一切特惠或限制的制度,一经完全废除,最明白最单纯的自然自由制度就会树立起来。”(同上)李嘉图在他的著作中常常运用“经济规律”这一概念,并且认为政治经济学的对象是研究分配的经济规律。1820年10月9日他写给马尔萨斯的信中说:“你认为,政治经济学是研究财富的性质及其原因的,而我则以为,应把它称作是对于决定着所生产的产品在参与产品生产的各阶级之间的分配规律的研究。”他认为这“才是科学的真正的对象”。

(《大卫·李嘉图的著作和书信集》佩·斯拉法编,第8卷,英国剑桥大学1952年版第278页)。在他看来,政治经济学就是要研究客观上存在的经济规律,借以遵循这些规律来促进生产的发展。

古典政治经济学关于经济规律客观性的思想,是他们对政治经济学的重要贡献。马克思认为他们的“巨大功绩”是他们“把这些形式看成社会的生理形式,即从生产本身的自然必然性产生的,不以意志、政策等等为转移的形式。这是物质规律;错误只在于,他们把社会的一个特定历史阶段的物质规律看成同样支配着一切社会形式的抽象规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册第15页)

古典学派关于经济规律客观性的思想,是和他们重视经济利益的研究分不开的。他们事实上是从经济利益的客观性引伸出了经济规律的客观性,承认经济利益的客观性是他们承认经济规律客观性的基础。早期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就很重视经济利益的研究。威廉·配第在他的著作中处处都以维护英国经济利益的面貌出现,但是他实际上是维护当时英国资产阶级的利益。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是在国家利益的幌子下谋取。布阿吉尔贝尔则认为生产给人们以经济利益,而经济利益又反过来推动生产的发展,如此循环不已,促使国家的经济繁荣(《谷物论》第11页)。亚当·斯密进一步把个人经济利益提到了首位,首次运用了“经济人”这个假设。他所谓的“经济人”,就是不抱其它动机,只追求经济利益,并按经济原则进行活动的人。他把社会一切经济现象都看成是这个具有个人利己主义本性的“经济人”活动的结果。个人利己主义被作为经济活动的内在动力。亚当·斯密认为虽然每个人追求的是个人利益,但是每个为自己利益打算的人又不能不顾到其他的为自己打算的人的利益,从而就自然地产生了相互的共同利益。所以他认为个人利益不仅不同社会利益相矛盾,而且是一致的。他说:“每个人改善自身境况的一致的、经常的、不断的努力是社会财富、国民财富及私人财富所赖以产生的重大因素。”(《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第163页)他论证了追求个人经济利益的正当性,并且把它看成是增加社会财富的源泉。李嘉图继承了亚当·斯密的思想,他认为只要每个人能够自由地追求个人的利益,就能够最好地建立整个社会的普遍幸福。他说:“在商业完全自由的制度下,各国都必然把它的资本和劳动用在最有利于本国的用途上。这

种个人利益的追求很好地和整体的普遍幸福结合在一起”。（《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第113页）

古典政治经济学重视经济利益的研究，看到经济利益是人类一切经济活动的基础，这是正确的。因为经济关系归根到底总是表现着一定的经济利益。政治经济学就是要研究通过一定经济关系表现出来的种种经济利益。正是由于如此，所以亚当·斯密关于“经济人”的假设，也有其“合理成分”，因为他把人看成是经济利益的承担者。马克思就曾明确指出：政治经济学所“涉及到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2页）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离开了时代和阶级，抽象地和超历史地看待这个“经济人”，并借以宣扬资本主义的永恒性。

由于承认经济规律的客观性和把经济利益看成是经济发展的动力，所以古典学派又提出了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威廉·配第就有自由放任的思想。他曾经说过：“我要对世界说明的是，我并不认为我能改善世界的情况；我认为，为了使每个人各得其所，最好让事物……自行其是。”（《赋税论》第15页）。布阿吉贝尔认为“大自然是酷爱自由的”（《谷物论》第69页），他把重商主义对经济的干预称为“反常状态”，大声疾呼要“恢复事物的自然状态，这种反常状态的结束，也将消除公众的祸殃。”（《论财富、货币和赋税的性质》第83页）魁奈则明确提出“必须维持商业的完全自由。因为最安全、最确实、对于国民和国家最有利的国内商业和对外贸易的政策，在于保护竞争的完全自由。”（《农业国经济管理的一般原则》。《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选辑》第234页）亚当·斯密提出了“一只看不见的手”的学说，从而为资产阶级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他说：“他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在这场合，象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也并不因为事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第27页）亚当·斯密所说的那只“看不见的手”，实际上就是指商品经济中价值规律起着的自发的调节作用。

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这些思想都是一定时代的反映。究竟应该怎样来评价这些思想呢？特别是对于我们今天研究社会主义的经济关系还有无值得借鉴的地方呢？我们认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这些思想包含有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一方面它反映了资产阶级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要求，表达了资产阶级在其上升时期反对封建主义和重商主义，为建立本阶级的阶级统治的愿望，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另一方面它又曲折地反映了经济发展过程的客观规律，触及到了经济生活中某些内在的联系，因而又有其“合理的成分”，在今天仍然可以为我们所批判地加以继承，用来研究社会主义的经济关系。

长时期以来人们承认古典政治经济学在劳动价值论，在利润、利息和地租等剩余价值具体形态的研究方面以及在再生产等方面作出过贡献，承认他们的学说在研究资本主义经济时有值得借鉴的地方，但是却很少提到他们在政治经济学的一般原理方面有过贡献，更没有提到他们的学说中还有我们在研究社会主义经济时也可供批判地加以继承的东西。我们认为，这是不全面的。事实上，个性和共性，特殊和一般密切相连，古典政治经济学在研究资本主义这种特定的生产方式时，不可避免地又必然要曲折地反映出某些不同的生产方式所共有的东西。这些被曲折地、那怕是被以歪曲地形态反映出来的共有的东西，只要经过我们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地分析批判，就可以成为我们研究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时作为借鉴的宝贵的思想资料。譬如古希腊是奴隶制的生产方式，古希腊的著作家探讨的是奴隶制的经济问题，但是马克思认为研究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有关的原则和定理,也能在古代希腊社会的著作家那里见到。马克思说:“这只是因为一定的现象,如商品生产、贸易、货币、生息资本等等,是两个社会共有的。由于希腊人有时也涉猎于这一领域,所以他们也和在其他一切领域一样,表现出同样的天才和创见。所以他们的见解就历史地成为现代科学的理论的出发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68页)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本质的不同,它们以各自的特点而互相区别开来,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它们又有某些共同的东西,这些共同的东西使这两种不同的生产方式联系起来。所以古典政治经济学在涉及这些共同的东西时,也有一些值得我们在研究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时批判地加以继承的思想财富。

首先,重温一下古典政治经济学关于经济规律客观性的思想,对我们研究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就很有意义。当然,这个思想在今天对于我们来讲并不是什么新鲜思想,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早就解决了的,特别是斯大林同志曾经就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客观性问题作过十分精辟的论述。马克思列宁主义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础,对经济规律客观性所作的科学阐述,和古典政治经济学还在摸索、试验,还在政治经济学发展史上刚刚开始形成的关于经济规律客观性的思想相比较,两者实在有天壤之别。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规律客观性的科学阐述是远非古典政治经济学那些还在萌芽、还在摸索,特别是还和混乱的观念交织在一起的经济思想所可比拟的。但是重温一下古典政治经济学关于经济规律客观性的思想,对我们研究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仍然是有益的。众所周知,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在承认还是不承认经济规律客观性这个问题上,并不是一帆风顺,没有斗争的。叶剑英同志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一九五八年,在经济工作的指导上“违背了客观规律”,离开了深入调查研究、一切经过试验的原则,犯了“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的错误,加上三年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废止合同,撤退专家,使我国国民经济在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遭受了严重的挫折。后来,在林彪、“四人帮”横行的十年期间,他们出于反革命的需要,蔑视和否认客观经济规律,取消政治经济学,更给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导致国民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列宁曾经说过,“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以为……只有通过纯粹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这条直路,才能摆脱愚昧状态,那就是最大的而且是最坏的错误。”(《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列宁选集》第4卷,第605页)因此,列宁认为还必须把十八世纪末期那些战斗的无神论的文献翻译出来,广泛地传播到人民中去。我们认为,列宁的这个思想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工作同样也是适用的。学习和研究古典政治经济学关于经济规律客观性的思想,不仅可以直接从古典学派那些精辟的论述中吸取有益的资料,而且还可以使我们在更长期的历史过程中更加清楚地看到,承认经济规律的客观性,这是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三百多年来所反复证明了的科学真理,是政治经济学得以成为一门科学的前提,也是我们按经济规律办事的前提。

其次,古典政治经济学重视经济利益的研究,对于我们研究社会主义经济仍然有重要的启示。这是因为政治经济学是以经济关系为研究对象的科学。经济关系从根本上来讲就是人们的物质利益关系。恩格斯曾经指出:“每一个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是作为利益表现出来。”(《论住宅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307页)研究经济利益正是政治经济学区别于其它社会科学的一个最重要的方面,同时也只有通过人们对人们经济利益的研究,才能揭示经济运动的规律。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经济利益,包括社会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以及由这些经济利益组成的利益关系体系是一种客观存在,是不以人们的意志、意识和愿望为转移的。人们只能

认识它,利用它,并依靠它来推动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长期以来,尽管政治经济学在社会主义部分的研究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也有很多不足之处,而对社会主义经济利益研究不够,更没有把它提到应有的高度,就是对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研究中的一个十分薄弱的环节。因此从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我们应该得到的一个重要启示,就是必须认真研究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的经济利益问题,研究社会主义的经济利益关系体系以及正确处理这些利益关系的原则、方针和方法。同时古典政治经济学认为经济利益是人们经济活动的内在动力的观点,也不能简单地予以否定,而应该看到其中有它合理的成分。恩格斯在批判英国功利主义哲学家边沁的思想时曾经指出:“他使主体从属于谓语,使整体从属于部分,因此把一切都弄颠倒了。最初他说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是不可分的,后来他只片面地谈论赤裸裸的私人利益”(《英国状况十八世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675页)。马克思曾经说边沁的观点“不过把爱尔维修和十八世纪其他法国人的才气横溢的言论枯燥无味地重复一下而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69页)亚当·斯密和李嘉图正是在十八世纪的法国启蒙哲学和边沁的功利主义哲学的基础上,建立了他们关于经济发展动力的思想的。他们的错误在于把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关系弄颠倒了,只是片面地谈论赤裸裸的私人利益。而其合理成分就是看到了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是不可分的,没有把它们割裂开来和把它们绝对地对立起来。其实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经济利益仍然是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马克思说:“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8页)列宁也说:“利益‘推动着民族的生活’”。(《列宁全集》第38卷第86页)经济利益的这种根本动力作用,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是通过正确处理社会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相互关系而得到发挥的。我们应该从古典政治经济学关于经济利益是经济发展内在动力的思想中吸取有益的成分,认真研究把社会主义的社会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结合起来的途径和办法,从而发挥经济利益的动力作用,推进国民经济的发展。

最后,古典政治经济学关于“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主张和亚当·斯密关于“一只看不见的手”的学说,对于社会主义国家制定经济政策,特别是建立科学的社会主义经济管理体制仍然有值得借鉴之处。当然社会主义经济是一种以公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国民经济是在国家计划的指导下发展的。所以古典学派“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对社会主义经济在原则上是不适用的。但是应该看到社会主义经济仍然是商品经济,既然是商品经济,价值规律就有广阔发生作用的场所。事实上,价值规律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中仍然有一定的调节作用。国家可以而且必须利用价值规律来调节经济生活,把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结合起来。因此,不可不说在社会主义经济生活的某些领域,仍然可以而且必须利用亚当·斯密所说的那只“看不见的手”来调节经济生活的发展,而不必事事都要用“看得见的手”来调节呢?毛泽东同志就曾经提出国民经济管理的基本原则是“统一计划,分级管理”和“大计划、小自由”。我们是否可以在国家集中统一领导的大前提下,执行一种有限度的“自由放任”政策呢?我们认为这完全是可以研究和考虑的。

总之,社会主义经济对我们还是很大的一个“必然王国”。在加强对社会主义经济的研究中,以科学的态度对待古典学派的一些思想,对于我们仍然有重大的现实意义,社会主义经济的研究必须而且可能从古典政治经济那里批判地继承一些有用的东西。